

關於歷史評價問題

嵇文甫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2305

關於歷史評價問題

嵇文甫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關於歷史評價問題

嵇文甫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79·787×1692 $\frac{1}{32}$ ·1 $\frac{5}{8}$ 印張·34,000字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0 定價：(6)0.16元

目 錄

小 引

一 人民性与進步性——歷史評價的基本尺度	4
(1) 站在廣大人民方面說話	4
(2) 推動歷史前進呢, 还是作歷史前進的絆脚石?	7
(3) 階級立場与歷史主义	11
二 歷史評價中的矛盾性与具体性	15
(1) 歷史充滿了矛盾	15
(2) 絕對主义与相对主义	18
(3) 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	22
三 歷史評價中的现实政治意义	27
(1) 講歷史不要忘了当前政治任务	27
(2) 反客观主义	28
(3) 也不是主观主义	30
四 歷史評價中常牽涉到的幾個理論問題	33
(1) 動机与結果	33
(2) 个人与羣众	36
(3) 偶然与必然	39
(4) 成功与失敗	44

小 引

这本小册子是就幾年來我所做關於歷史評價問題的幾篇報告整理補充而改寫成的。當做這些報告的時候，本來只是想幫助歷史教師們解決一些教學上的疑難問題；可是在這次改寫過程中，正碰到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高潮，這就使一些論點格外明確，而更具有戰鬥的意義。

教歷史不單是講故事，它要通過具體的人物和事件，揭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拿活生生的經驗教訓，給人們指出應走的道路。這是一種思想教育，是一種有力的思想鬥爭。可也正因为這裏面具有戰鬥性、階級性，所以就連反動統治者也向來都把修史當作一件大事，緊緊抓住歷史這武器，“寓褒貶，別善惡”，選定典型，樹立旗幟，企圖把人民引入自己給他們所規定的道路。為着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惜捏造事實，顛倒黑白，歪曲歷史的真相。中國歷史中的一些糊塗賬，把人們搞得眼花撩亂，就是歷來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那班御用學者攪鬧出來的。

例子不用遠舉，眼前就有胡適這個大騙子，專門給萬惡的腐朽透頂的反動統治階級効勞，最惡毒最無恥地極盡歪曲歷史的能事。他在中國思想界攪鬧了幾十年，恰巧又特別垂青歷史這門學問，自稱有“歷史癖”，於是乎中國歷史就大倒其霉，任憑他信口雌黃，“翻手為雲覆手雨”，把幾千年來的功罪、善惡、是非、邪正，攪亂得一塌糊塗。這樣，在歷史評價問題上，胡適就成為我們首先要對付的一個險惡敵人。

現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我們一定要把歷史奪回到人民手中。對於過去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我們都需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照下予以重新估價。對於一切反人民的謬論，特別像胡適之流的胡說八道，我們必須掃蕩廓清，決不容許它們再混淆是非，迷惑青年。

當然，要掃除各種反動歷史觀點，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新尺度來衡量每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很多歷史教師感到歷史評價的困難，這是不難理解的。可是有人說：“這很好辦。既然是時代變了，歷史評價的標準也變了，那末，來它個大翻案，凡是从前認為好的都說成壞，从前認為壞的都說成好，不就得了麼？”這是一種很幼稚的想法。其實有些人，像秦檜，从前說他壞，現在仍然只能說他壞，決不會就說他好；像岳飛，从前說他好，現在儘管說法有些改變，但仍然是說他好，也決不能就說他壞。還有像漢武帝，唐太宗……這一類人，從來評價就很複雜，這案又怎樣翻法？顯然，這種無原則的簡單的翻案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又有人認為：“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個封建社會。譬如生在大污泥坑中，誰也免不得沾上一些泥污。岳飛也罷，秦檜也罷，反正都是封建人物。不管什麼軍事家，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還不都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甚至像黃巢、李自成，那些農民革命領袖，也免不了要當皇帝。唉，一邱之貉！”這樣，對於歷史人物來一個全盤否定，也就用不着再作什麼評價。這樣，也就全盤否定了歷史，也就根本不用講歷史了。

和這樣看法相反，又有人來了個全盤肯定的看法：“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就封建說封建，當其時只能是那個樣子。就連秦檜，也自有秦檜的道理呀。”這樣，講歷史只是專門替古人——不管是怎樣的古人——作辯護士，還那裏說得上“評價”？

以上兩種看法，各執一偏，尽管彼此相反，可是同样都把歷史評價攪混了，或者簡直可以說都是根本取消了歷史評價。對於歷史人物不能漫而言之，籠統一大包都寬容，或者籠統一大包都罵倒。我們對於現實人物——連地主和反動派在內——都要按其具体情况，分別對待，對於歷史人物又何嘗不是这样。“好”是怎樣的“好”？“好”到什麼程度？“坏”是怎樣的“坏”？“坏”到什麼程度？這裏面都要有一定的分寸。像那样籠統一大包的辦法，比起簡單的翻案法也實在並不高明多少。

那末，怎样办呢？歷史評價究竟有沒有可靠的標準呢？当然有的。下面就要談談這個問題。

一 人民性与進步性——歷史 評價的基本尺度

(1) 站在廣大人民方面說話

我們的歷史，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而是人民的歷史。人民是歷史的主體，一切歷史評價都得看符合人民利益與否為標準。凡是屬於人民方面，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所歡迎的，都應該予以好的評價，而對於一切反人民的都予以壞的評價。這是很明白的道理。我們看，像黃巢，李自成這班人物，在舊日反動的歷史書上不都是把他們當作賊寇，盡量加以誣蔑麼？可是現在都被尊為農民革命領袖。因為他們的確都是從人民中來，代表人民利益，和廣大人民一道，向反動統治者作鬥爭，的確都是人民所歡迎的英雄人物。像這一類千百年來為多少御用學者所誣構而成的最不公平的歷史冤案，當我們人民的時代，自然是一定要把它翻過來；乃至所有向來埋沒在社會下層，被反動統治者踩在腳下的，現在也都抬起頭來，得見天日；而一切獨夫民賊，騎在人民頭上的人，掠奪人民、欺騙人民的人，却都要在人民的歷史裁判前受到他們應得的懲罰。我們要來個歷史大翻身。

但是，我們不是唯成份論者，不能單憑階級出身來作歷史評價。如武訓，縱然是個乞丐，是從社會下層被壓迫人民中出身，我們却只能說他是個封建奴才。因為他替他的封建主子作欺騙人民的勾當，早從人民的隊伍中背叛出去了。至於對統治階級的歷史人物，我們也不能一筆抹殺。在他們中間，有的是除了毒害人民以外，再沒有別的事情，有的却也能對人民有一定的貢

献。事实上，由於人民力量的强大，稍为聰明一點的統治階級人物，也常常要考慮一下人心的嚮背，做出些有益於人民的事情以收攬人心。人民因此也就擁護他。不管由於什麼動機罷，只要他對人民有一些好處，人民決不埋沒他。人民的眼睛從來是雪亮的。

在過去統治階級的人物中，也有所謂“功德在民”的。禮記上講：“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這就是說：有創作發明為大家所遵行使用的，獻身於某種事業的，對安定國家有勞績的，能防止水旱等自然災害的，能抵抗侵略外患的，都要被紀念，被歌頌。這就是所謂“崇德報功”。自然，過去統治者所謂“功德”，自有他們一定的具體內容，我們姑且不管。現在照我們自己的看法，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都可以說是“法施於民”，值得我們紀念。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是屬於統治階級的人物，就抹殺他們在創作發明上的功績。他們所發明或改進的筆和紙，不僅可以供當時統治者使用，直到現在，我們不是也還在使用麼？又如“以死勤事”，勤的什麼“事”呢？有些“事”固然是專為着統治階級，但有些“事”也不盡然。正如晏平仲所說：“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過去許多所謂“忠臣義士”，自然有些只是為君主個人而犧牲，那只能算君主的私人（私暱），不干人民的事；有些却有更大的意義，既不限於君主個人，也不限於一家一姓的“社稷”，如文天祥、史可法，他們的犧牲，關係着全民族，自然是應該受到人民崇拜的。

根據以上所說的精神推論下去，歷史上許多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就當時說，他們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可是直到現在，像孫子兵法這類書，不是還給我們種種啓發，成為我們軍事學的寶貴遺產麼？我們打開左傳、通鑑等書來看，歷代名將在軍

事學上都有很多貢獻。政治上像管仲、子產、諸葛亮以及其他許多所謂明君、賢相、清官，也的確有些好辦法，因而“遺愛在民”。又如歷代的學者、文人，像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黃宗羲、王夫之等，自然也不能說他們和統治階級沒有關係，可是又誰能否認他們對於人民的偉大貢獻呢？歷史上許多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只要對人民有貢獻，都是應該表揚的。至於許多從歷史上傳下來對人民很有用的東西，那都是歷代人民的勞動所創造的公共財富，我們也不應該拋棄，硬劃歸統治階級的名下。

當然，首先还是要明確立場，劃清界限，不能把對人民多少有一點貢獻的統治階級人物，隨便都稱作人民文學家、人民藝術家、人民教育家……。本來，在封建主和奴隸主所統治的社會中，所有政治、經濟、學術、文化都為他們所獨佔；真正屬於人民方面的，都被打在地獄，我們很難見到。如果能從千百年沉埋中發掘出一點真正屬於人民的東西，縱使它還僅僅處在不成熟的萌芽狀態，我們也將看成至寶。但是可惜這些東西總是很少見的。拿先秦思想家來說，儘管有許多傑出人物，從他們揭發暴露當時統治階級的罪惡方面來說，往往帶有人民性，甚至很強烈的人民性；可是一露出自己的本來面目，就從人民方面溜開了。例如孟子，痛罵“獨夫”、“民賊”，大聲替人民呼籲，可以說具有極強烈的人民性；可是一拿出他自己的正面主張和根本見解來，卻又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那一套貴族統治思想。他的道貌岸然的正統氣味，把他的人民性竟掩蔽起來了。因此，我們對於孟子，雖然指出他的人民性加以表揚，卻終不能把他一直放到人民的陣營裏，輕易送給他一個人民思想家的稱號。這個界限是不容混淆的。又如莊子，也具有強烈的人民性。“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

而仁义存焉”——这句话把当时统治者的醜惡詐伪，揭露得多麼痛快淋漓！但是一說到究竟，却又逃避现实，完全遁入虛無主义的幻想，正反映着一种沒落階級的思想意識。这种思想毒素是不容許混入人民陣營的。

總之，我們作歷史評價也必須“一面倒”，堅決站在人民立場上。人民利益就是歷史評價最基本的尺度。毛主席教我們“眼睛向下”。不僅幹革命，做实际工作，需要这样，就是研究歷史，做歷史評價，也都得这样。從來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文藝，毛主席却因其為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而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大大加以發揚。久被歧視，不齒於科學之林的中醫，毛主席却因其集中了幾千年來廣大人民的經驗智慧，對廣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曾有过長期的貢獻，並且現在也还联系着廣大人民，起很大作用，所以特別提出來教大家予以重視。如大家所熟知，他一把抓住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深知農民革命是中國歷史進化的真正動力。這些地方，除非常常“眼睛向下”，看到社會底層裏，和廣大人民的思想交流在一起，是領會不出來的。（說到這裏，又想起胡適。他看不起祖國文化遺產，把農民起義看成流寇，正是他一貫看不起人民，一貫反人民的具体表現，和這裏所講恰成一個對照。）在這個歷史評價中的人民性問題上，我們也必須向毛主席好好學習。

（2）推動歷史前進呢，還是作歷史前進的絆腳石？

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怎麼叫做好？怎麼叫做壞？合乎歷史發展規律，推動歷史前進的，就叫做好；違反歷史發展規律，阻礙歷史前進的，就叫做壞。歷史是廣大人民的歷史，推動歷史前進就是廣大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廣大人民也正是歷史發展的最大推動力。根本說來，中國歷史的進步，是由於廣大人民的勤

勞、勇敢和智慧；中國歷史的停滯，則由於歷代奴隸主、封建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因此，表揚人民的創造發明、革命鬥爭、推動歷史前進的功績，揭露反動統治階級阻碍歷史進步的罪惡，就成為歷史評價最主要的任務。

但是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也不能說在歷史發展上沒有起過一些進步作用。如秦始皇雖然是一個專制暴君，但是他結束了古代封建領主割據紛爭的局面，創立了一個空前的統一大帝國，在中國歷史上截然劃出一條界綫，這種偉大的歷史進步意義無論如何是不能抹殺的。又如漢武帝，唐太宗，開疆拓土，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有很大貢獻。中國所以能成為像現在這樣廣土眾民多民族的統一大國，是和這些大皇帝的活動分不開的。如果說在俄國歷史上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那末，在中國歷史上，像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這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應該說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的事業都是有偉大進步意義的。不過這裏得說明一點。這些皇帝所以能推動歷史的車輪，有那樣偉大的成就，仍是由於他們在某些方面執行了廣大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如秦的統一，漢唐的開疆拓土，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正合乎羣眾的要求。假如不合大勢，不得人心，而隨意亂動，其結果總遭失敗，如隋煬帝征高麗，唐明皇征雲南，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即如漢武帝征大宛，唐太宗征高麗，由於不合大勢，不得人心，也還是吃了些虧。以此類推，偉大工程的興建，科學技術的發明，許多英雄人物在歷史上發揮的進步作用，其背後都有廣大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作依靠。離開人民，什麼帝王將相，英雄偉人，都做不成事業的。

再說，所謂進步性乃是就某一特定歷史時期而言，只是從當時看，而不是從現在看。如果拿現在的標準來衡量古人，當然都不夠格，都是落後的，還有什麼進步性可講呢？如後漢張仲景，

是个大医学家，他所著“伤寒論”多年來当作济世活人的書，在中國医学史上有極大貢獻。如果一定要指摘他那裏面充滿了陰陽五行，烏煙瘴氣不科學的東西，責備他道：“為什麼不根據解剖學呢？”這就未免開玩笑。請問當漢朝時候那裏去找解剖學呀！又如黃巢，李自成，不成問題，都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農民革命的英雄人物。但是，正如斯大林論拉辛和布加喬夫那班俄國農民起義領袖的話：“他們都是皇權主義者”（“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的談話”），假如他們不腐化享樂，不犯錯誤，一直前進，圓滿成功，也不過當一個“好皇帝”，解除一些農民的痛苦。橫豎決不會組織個蘇維埃。在近代無產階級沒有出現以前，農民革命總是沒有出路的。我們也不必因為他們当了皇帝就罵他們反動。其實在當時能作個“好皇帝”也就不算壞了。比如朱元璋，我們現在罵他“掠奪農民革命果實”，當然也是應該的。但這是提高到現在所認識的原則上講，也倒不一定單純地只因為當皇帝就罵他——朱元璋後來離開農民，變成封建主了。但是他在當皇帝以後，究竟也作了一些解除元朝苛政，與民休息的事，還是滿足了一些農民的要求。通過農民革命而產生出來的新王朝，像漢高帝、明太祖那樣的政權，雖然並不是農民政權，但是由於他們採取一系列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總多少緩和了階級矛盾，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條件，使中國歷史還可以往前走。這便有它一定的進步意義。

莊子天地篇上有這麼一個故事：子貢出游，過漢陰，見一個老農種菜園，“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一罐子一罐子的澆地，用力很多，而成績很小。子貢就告訴他：“有一種器械，一天能澆一百畦，又省力又有功效，你不願意用嗎？”老農仰而視之，說：“咋着？”子貢告訴他說：“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沝湯，其名為槲”。子貢把槲的巧妙形容得了不起。但是老農听罷以

後，忿然作色說：“有機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备，純白不备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这就是告訴子貢，桔槔太机巧了；用了以後人心就变坏了。所以最後他說：“你那个法子我不是不知道，我不过羞而不为！”要讓我們現在想，桔槔有什麼稀奇？落後的很！但是在戰國時代，却把它看成那样机巧的东西。我們嫌它太落後了，戰國的老農却还嫌它太進步了！（自然，莊子這段寓言是一種開倒車想法，不見得當時人都这样想。但“槔”在當時畢竟是一種新工具，所以為守舊分子所不喜。試看唐詩裏面，就說：“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顯然把桔槔當成一種古老東西看待。這是時代進步的表現。）歷史上許多事情正是这样。我們現在會說：奴隸制多落後，多殘酷！但是它正和桔槔一樣，在當時很有進步性，至少捉住俘虜以後，不再都殺掉了。農民想好皇帝，想堯舜，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也不過是“桔槔”而已。包拯那樣的“清官”，諸葛亮那樣的“軍師”，都可算是“桔槔”而已。我們應該充分估計到桔槔在生產工具發展上的進步意義，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要在今天來提倡：“我們用桔槔！”“我們要好皇帝！”誰要是這樣主張，我們準會罵他是頑固派，保皇黨！把這個道理應用到思想史上，承認孔子有一定的進步性，並不是要提倡尊孔讀經。我們必須劃清時代界限。

最好還是看毛主席。他講“先進的中國人”，開出一系列名單：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孫中山。試想，康有為搞“保皇黨”，搞“復辟”，搞孔教，頑固成什麼樣子？怎麼也成了“先進的中國人”？這會使你大吃一驚吧！如果拿我們現在的尺度來衡量，豈止康有為，甚至連孫中山也還有他的落後面，洪秀全更不用說，捧袁世凱當皇帝的嚴復自然越發不在話下。那末這個名單豈不大成問題嘛？但是誰也不能否認，這些人在一定歷史階段上，在一

定限度內，都曾起過進步作用，他們的確都是那一個時期的先進人物，儘管他們後來有些簡直開起倒車了。還不止這幾個人，毛主席在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的時候，講了一段話，先說：三年以來為解放戰爭而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接着說：三十年來為人民革命而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最後更說到：近一百年以來所有為爭取民族獨立自由而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這段話真是講的好！不僅總結了三年以來的解放戰爭，近三十年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且也總結了中國近百年來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這裏面包括了多麼複雜的各方面的人物，可是都被列在“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以內。毛主席已經把“永垂不朽”的人物上推到一百年，我們如果再往上推，來一個“三千年以來——甚至五千年以來——所有一切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對人民有貢獻，為祖國奮鬥和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好不好呢？其實毛主席也已經教我們“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了。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看法。根據這種看法，一方面要嚴格劃清時代界限，對於歷史上無論怎樣了不起的人物，都要認識他們的局限性，決不作過高的估計，隨便把他們和現代人物相提並論；但同時，另一方面，必須根據當時具體歷史條件，分析批判，各如其分，只要在這個連綿不斷的歷史大流中任何一小段上有任何一點一滴的貢獻，就必須把它肯定起來，承認它一定的進步性，決不讓它埋沒。

(3) 階級立場與歷史主義

作歷史評價，首先要明確階級立場。這個問題好像很簡單。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廣泛一點說，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具體到歷史教學上，我們對每一歷史人物和事件，都站在當時廣大人民的立場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去講話，这不就對了麼？可是有人提

出這樣的問題：我們講歷史，究竟是不管任何歷史時期，都始終一貫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呢？還是當奴隸制時期就站在奴隸立場上，當封建制時期就站在農民立場上，不斷變化呢？離開無產階級立場是不對的。可是如果我們講到各個時代都用現代無產階級的尺度量一量，說過去的這也不成，那也不成，豈不違反歷史主義？我想立場只能是一個立場——無產階級立場。歷史主義本身就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別的階級不會有歷史主義。封建主有歷史主義麼？農民有歷史主義麼？沒有的。資產階級像胡適之流，雖然好像也標榜什麼“歷史主義”，但那顯然是一種假歷史主義。我們所謂歷史主義，是唯物論的歷史主義，胡適所講的是主觀經驗論的歷史主義。唯物論的歷史主義，能抓住歷史的本質，歷史發展的動力和規律；主觀經驗論者却只能片面的，孤立的抓住些歷史的表面現象，就信口雌黃。如胡適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只講它怎樣破壞，把黃巢、李自成這些英雄人物都看成流寇，殺人的妖精。像義和團那樣偉大的運動，他把它罵的不值一文。至於像毛主席所講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樣的結論，反動的胡適是不能理解的。另外他對王莽那樣的人，却大為誇獎，說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會主義者，就沒有看一看他的階級本質，就沒有想一想在那個時代能不能就出現社會主義。這就可以看到胡適乃至其他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縱然自稱為歷史主義，但他們恰巧是反歷史主義。

這一點很重要。只有認識唯物論的歷史主義的本質，才能認識歷史主義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有些人所以顧到歷史主義就顧不到無產階級立場，顧到無產階級立場就顧不到歷史主義，其原因就是對這兩個概念根本沒有弄清楚。歷史主義本身就是工人階級立場，無產階級不是公式主義者。我想關於這一點，大家

最好看一看“共產黨宣言”第四章所講共產黨對當時各個黨派的態度。當時共產黨在各國的力量還不太大，它既不是拋開各國具體歷史條件，到處提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作為直接行動的口號；可也不是一味遷就妥協，放棄無產階級的根本立場而向資產階級投降。它總是站在各國進步黨派那一面，一方面和他們携手並進，另一方面也批判和糾正它們不足的地方，把當時具體的歷史一步步推向前進，直至工人階級取得最後勝利。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當北伐大革命時，不是講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在新三民主義的基礎上，促成國共合作，引導資產階級政黨走上革命，但也看出它的不足。後來當抗日戰爭時期，國共第二次合作，毛主席更把新民主主義和三民主義嚴加區別，指出兩種思想體系之不同。這就說明共產黨，不是拿着公式亂套，既不陷於空想，也不作別人的尾巴。雖然和資產階級進步的一面合作，但我們還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這是黨的現實政策。

如果我們根據黨的現實政策往上推，已往的歷史也可以如此。當然，那時候還沒有工人階級。可是試設身處地，在當時歷史發展的條件下，要是工人階級領導，應該怎麼樣？既不能空想冒進，也不能妥協取消。當時革命的羣眾和力量是農民，農民革命的最高要求是好皇帝，如果你說，只要求個好皇帝，太落後，怎麼不組織個人民自己的政權呢？這不僅陳勝、吳廣時代不能提，就是在“太平天國”時代也不能提，提出來就是違反歷史主義。在當時具體歷史條件下，只能要求個好皇帝。那末是不是說這就等於站在農民立場上，把“好皇帝”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呢？絕不是這樣。我們是站在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看農民革命的。“好皇帝”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可是我們還要再向前發展。我們在各歷史階段上永遠站在各進步階級的最前列，一直把革命向前推進。關於這，我可以借用王國維“人間詞話”的一段話